

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

# 國際漢學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International China Studies

第十期  
2014. 12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漢學之路

### 認同與方法：什麼是國際漢學？

柯馬丁(Martin Kern)

我想先稍稍反思一下我的漢學之路。我的漢學之路，其實包括幾段既相互獨立、又有所交叉的道路。這些道路，都不是我事先計劃過的，也都超出了我的預料。

我的第一段漢學之路，始於當代中國。1987年至1989年，我在北京大學學習，一開始是在對外漢語中心，後來轉入中文系。來北大之前，我已在德國科隆大學研習了兩年漢學。來北京，是爲了研究當代中國詩歌。我認識了一些詩人，也喜歡當時的氛圍，充滿了強烈的求知慾和實驗精神。那時的北大，很多個夜晚都有詩歌朗誦活動，吸引了數以百計的學生。然後，我發現，想要理解當代中國，還需要知道得更多，也就是說，需要理解中國的傳統。所以，我開始對六朝詩、唐詩發生了興趣。難以置信的是，我有幸師從袁行霈教授，能夠在教室裏、在他家裏聽他講論。回到科隆大學後，我完成了我的碩士學位論文，內容便是關於中國古典詩歌，尤其是六朝詩歌。接着，我又開始撰寫西漢宗廟頌詩的相關論文。從那個時候起，我回溯得越來越遠，於是，到了現在，先秦文學就成了我的主要研究領域。

作者單位：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

我的第二段漢學之路，始於德國。研究漢學，是因爲我想要研究那些真正有別於我已經知道了的東西。所以，不久之後，我就意識到我應該來中國學習。我得到獎學金，在北大學習兩年，當時我甚至還得到了第三年的獎學金。不過，1989年6月以後，我決定離開。接下來的七年時間，我在科隆大學相繼完成了我的碩士、博士論文。然後，1997年1月1日，我前往美國，師從華盛頓大學的康達維(David R. Knechtges)和鮑則岳(William G. Boltz)教授。原本打算只在美國待上六個月或一年，結果，十七年後的今天，我還待在美國。有兩次我曾考慮過重回歐洲，結果兩次又都決定留在美國。這就是我的第二段漢學之路，新的國家、新的大學讓這一切成爲可能：我持德、美兩國護照，在美國、中國、日本、韓國、意大利、英國、荷蘭擔任教授一職。

我的第三段漢學之路，始於漢學。不過，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我就以德國文學、中國藝術史和歐洲藝術史作爲自己的副修科目，一直到我取得博士學位。攻讀碩、博期間，我運用了歐洲學術傳統中的方法論著作，但也只是以一種相當普遍的方式；對我來說，最重要的還是中國文學、中國歷史的細節，我在一個非常傳統的框架中探索這些細節。近年來，我指導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國，其中包括很多中國學生，每年我也多次來中國參加會議、作講座，於是，我發現自己踏上了另一條道路：我無法想象只能就中國而研究中國了，我開始認爲，想要理解中國古典文學，就必需要具備更鮮明的比較視野<sup>①</sup>。我想，現在我能理解德國著名東方學學者、牛津大學教授馬克斯·繆勒(Max Mueller, 1823—1900)關於宗教研究的說法了，他說：“只懂一門宗教，說明不懂任何宗教。”(to know one religion means to know none)在我看來，這句話在我這裏可以引申爲：“只懂中國文學，說明對它一無所知。”

現在，想必在座各位大致能夠看出我這三條漢學之路是如何相互交叉的了：這三條道路合在一起，隨着時間的推移，我的知識活動不斷擴充延展。當然，我還是一位德國漢學家，我所有的工作也都還是圍繞着中國。但是，爲了做好我的工作，我必須去美國，必須在我的研究中具備更強烈的比較視野。

<sup>①</sup>我在其他文章中也表現了類似的一些想法，請參《柯馬丁談歐美漢學格局》，《東方早報上海書評》181輯(2012年4月1日)；《早期中國手鈔文獻研究方法之反思》，《國學學刊》，2011年4期，25—38頁。

這些，全都是選擇。別的學者做出了不同的選擇。我的一些美國同事，除了中文，其他外語都不會。他們有些人甚至還說，他們對比較古代中國與其他古代文明之間的異同毫無興趣。他們有些人認為，最好是嚴格就中國本身來研究中國，而且最好是只用中國的方法。我理解我的這些同事為何在中國同行中廣受歡迎，但我還是完全不能讚同他們。（我也不介意可能會在中國學術期刊上受到某一位美國同行的批評；顯然，他期待中國讀者會贊成他自己的保守思維。）

至今，我還記得當年科隆大學開設的一門德國文學課程，主題是德國經典。這門課的教授是著名的資深學者，他給我們這些學生開了一份長長的必讀書目，其中很多作品都不是德語作品。就是在這門課上，我發現，歌德，這位最典型的德國詩人、戲劇家、小說家，他最好的傳記是用英語寫成的，我們的教授堅持要我們閱讀這部傳記。記得當時我很驚訝，但我很快就發現，就理解德國文學而言，德國人既不具備壟斷地位，也沒有將之據為已有的方法。所以，雖說歌德深得我心，我也發現，我對自己身為德國人的認同，不是以這樣一種壟斷、佔有的方式捆綁在一起的。當然，這也與我們這一代德國人有關，我們這代人認為自己很難假定有所謂簡單、天真的德國認同。這種德國認同，更多意味着被納粹敗壞的德國人。像我的很多同時代人一樣，我首先將自己界定為歐洲人，然後才是德國人。來到美國后我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痛述納粹時期德國漢學家的被迫遷移<sup>①</sup>。我的文章在中國發表，我也能夠接受在我的姓名前冠以“美國”國籍、而不是“德國”國籍。

誠然，這是一個特殊的德國人的看法，不過，我相信，這裏也有某些東西是我和我那些來自其他國家的歐洲同事所共有的：我們都來自大陸，這個大陸從來沒有期望過文化和政治的統一，這個大陸在珍視全歐洲的共性時也珍視各自的差異。更重要的是，不管我們把自己民族國家的傳統叫做什麼，這些傳統都不全是我們自己的：這些傳統是通過彼此之間的多面向交互作用后才形成的，這些傳統屬於全歐洲人所有，它們不是某個單一文化的整體性產

<sup>①</sup> 請參拙作“The Emigration of German Sinologists 1933-1945: Notes o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Chinese Stud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8.4 (1998): 507-529; 中文譯本：《德國漢學家在1933—1945年的遷移：重提一段被人遺忘的歷史》，《世界漢學》，第三輯（2005），15—37頁。

物，而是在不同的歐洲語境中會引起不同的共鳴，對這些傳統的闡釋不僅能夠、而且也必須因地而異，所有不同闡釋的相互影響又層積在這些傳統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歌德，這個在讀過法語翻譯的幾部中國小說後創造了“世界文學”一詞的人，他既是德國人，也是歐洲人，或者說更像是歐洲人。歌德曾以官員的身份在魏瑪生活、工作過，而魏瑪宮廷的官方語言是法語。過去兩百多年來的衆多德語文學作品，也是在非德語的環境中寫就的。德國作家和作曲家在整個歐洲生活、工作。

原諒我在回到中國話題之前繞了一個大圈子，但這解釋了我以我的方式進入中國文學的原因。我認為，就文化生產和文化闡釋而言，我們更多受益於多樣性，而不是一體性，我們不能只是因為了解得不夠多，就無視“外在的”視野。內、外兩分法，根本就是錯誤的。有本書的書名很有名，題為“往事即異邦”（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都是外人。我們沒有哪個人，會說當時周朝、漢朝的語言。我們沒有哪個人，曾在周朝、漢朝生活過哪怕一天。我們所做的，就是重建我們自以為合理可信、有用的歷史版本。但是，這個合理可信，是對誰而言的呢？對於什麼東西來說才是有用的呢？德國歷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曾經認為，歷史書寫或許能夠告訴我們“歷史究竟是什麼樣子”。我們知道，他的這種看法不過是19世紀德國人的幻覺而已。今天，沒有哪位歷史學家能以無可救藥的天真態度重拾這種看法了。我們都清楚，歷史書寫總是服務於當下利益的，所以，同一事件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歷史版本，因為我們在寫作時抱有不同的目的。

那麼，這些相互競爭的歷史又是如何衍生出所謂的“國際漢學”來的呢？“國際漢學”是一個獨立的領域嗎？對此，我表示懷疑。就我的研究領域即中國古代（周秦兩漢）而言，研究方法上的差異似乎特別明顯。近年來，隨着“走出疑古時代”，我們看到了新一波的學術思潮。我們被告知，不要質疑傳統，要相信（“信”）、闡釋（“釋”）傳統，要呈現古代的“壯麗輝煌”。這是一種目的陳述：所“信”、所“釋”、所呈現的壯麗輝煌，都是中國傳統敘事框架內古代中國的光榮。我不懷疑古代中國的光榮。我研究古代中國，正是因為我認為它值得研究。但是，我不喜歡有人告訴我我的研究目的應該是什麼，我珍視“懷疑”，這在任何形式的研究工作中都至關重要。停止懷疑，意味着接受最便利

的敘事，意味着懶惰，意味着失去自我懷疑的能力。我的學生寫作博士論文時，我要他們出示那些與他們的觀點相左的證據。我把我尚未發表的論文拿給朋友們看時，我會說，請告訴我哪裏有錯誤。懷疑，不管懷疑的是傳統、習俗，還是懷疑謀求一己之私、迎合政治利益，都是探索和發現的開始。那些不想要懷疑，只想要相信、闡釋的人，不是學者而是監理人(curators)：他們想要保護他們自己最珍視的東西。我理解為什麼有人想這麼做，我也理解為什麼這樣做符合國家利益，如今“國學”概念中高調宣傳的就是這些內容。但是，我也認為這麼做貶低了我們這些學者，因為它將民族國家認同置於學術方法之上。

不過，不要讓我陷入懶惰的中西學者二分法之中，二分法本身就是錯誤的。我還要承認，西方學者的工作目的往往也是顯見的。大家都知道，最好的中國學術是鋒利敏銳、無所畏懼、甘坐冷板凳的。熟悉美國教授終身制的朋友也知道，很多論文都是作者為了保住自己的教職而炮製出來的，很多年輕學者也覺得必須要滿足充斥着行話的特定意識形態的需要。對於如何在自己的大學中取得成功，中西學者其實都心知肚明。實際上，因為學術體系和傳統的不同，從一開始起，就並沒有什麼所謂的“西方漢學”，我們或許只能在俄國、德國、法國的漢學傳統之間稍做區分。我的好朋友、德國慕尼黑大學的葉翰(Hans van Ess)教授，敢於出版他那部論“古代中國的政治歷史書寫”的大著，此書長達830頁，腳註近2400條，轉譯中文時用的是韋氏拼音系統(Wade-Giles system)而不是漢語拼音，我們都會微笑而稱他的這本書“很德國”，不僅僅是因為這本書是用德語寫成的，意味着全世界只有極少數學者能夠閱讀此書。當我翻閱我自己1997年來的博士論文時，我也說這本書“很德國”，我不會同意讓我的學生寫作這樣的論文，因為這違背了美國評判年輕學者的各項標準。(在美國，只有來自歐洲的學者，例如我自己，寫作這樣的論文才能得到別人的諒解。)同樣，很多美國學者的論文，也不會幫助作者在歐洲獲得職位。總之，就像中國的年輕學者在覺得有必要局限在傳統敘事之內、懂得自己可以安全地忽略任何國外的方法和重大問題時所做的那樣，我們的寫作都要面對我們自己的學術共同體的期待，我們都要屈從於各種各樣的壓力，我們又都會得到相應的回報。

由於學術傳統不同，我們的研究對象也有所不同：在中國召開的關於早期中國出土文獻的會議上，只有兩個論題至關重要，一是思想史，一是文字學，沒有什麼比討論一個未知的中國古文字更讓人興奮的了。聆聽德國學者(包括那些如今在美國任教的德國學者)的發言，你會發現他們關注的問題相當不同：手抄文獻的物質形態，不同的抄寫字體，句讀，修辭結構，文本的複合性，文本的多重來源(出於不同作者之手)，書寫與口頭性的關係。而很多這類問題，對於研究早期中國的美國學者來說都是陌生的，他們主要關注的是思想史，或曰“哲學”。所以，我與我的朋友牛津大學的麥笛(Dirk Meyer)、蘇黎世大學的畢鵬(Wolfgang Behr)在合作編纂一本新的、着重強調語文學的《中國手抄文獻手冊》時，我們主要倚重的是歐洲作者。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孫康宜(Sun Kang-i)在編纂《劍橋中國文學史》時，他們旗下幾乎全都是在美國工作的學者(只有現代文學部分的兩小節例外)。今天，在德國，唯一的一位古典中國文學教授是楊治宜，她在北大獲得碩士學位，在普林斯頓獲得博士學位。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很多不同的“西方漢學”，即便是在美國，不同的思想學派之間，其方法、路徑也相當不同。

《劍橋中國文學史》第一章是我撰寫的，這部書也讓我注意到了另一個與“國際漢學”有關的有趣話題。英文版出版三年之後的2013年，出版發行了中譯本，一年之內賣出了20000多部。我在綫閱讀了很多中文書評，也與此書編輯、北京三聯書店的馮金紅女士討論過中國讀者的接受問題。總的說來，這部書受到了熱情歡迎，儘管也有批評指出個別章節存在一些“硬傷”。但是，最有意思的批評，完全是別的東西：有中國同行抱怨說，這部書很遺憾地未能達到他們對一部真正新穎別緻的中國文學史的高期待！換句話說，我們這些美國學者太傳統了、太保守了，所以沒有實現中國讀者的期待，他們希望能夠從一個全新的視角來看待中國文學傳統。情況比較複雜。首先，我很高興看到中國讀者心存這些期待，他們對我們的工作表現出了真正的興趣。但是其次，這種批評本身也是傳統的、保守的，因為它沿襲的仍然是老一套的、錯誤的中西學術二分法。第三，這種批評也反映出一個有趣的誤解：其實，《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作者不是為中國讀者寫作的，他們是為西方讀者，包括那些不研究中國的讀者寫作的，其目的則是向這些讀者提供一種可信的、平衡的敘



述。我可不可以以一種更新穎的方式寫我的第一章？我可不可以把我自己那些激進得多的詮釋寫下來？當然可以。但是，我不是寫給專家看的，也不是寫給那些期待“不同”的中國專家看的。

這樣一來，我們也就面臨了一個基本問題：誰是“國際漢學”這一虛設領域的讀者？我們都在為誰寫作？從我目前的發言來看，在座各位想必也知道答案了：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地方，我們都為我們自己的讀者寫作。我們了解這些讀者，我們知道他們的期待，我們知道他們的前提預設，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論述建立在一個知識、理論的共同標準之上。我在引用除了中國研究之外的其他學科那些有影響的著名西方學者時，我和我的讀者具有相同的立足點；援引歐美思想，只要用得審慎明智、切中肯綮，就會被視為是有益的，能夠予人以啟發。就算有讀者不熟悉我所引用的某些著作，他們也會覺得自己應該熟悉這些作品，從而提高自己的水平。同樣，某些文化理論的運用也是如此：有些西方讀者可能並不完全知道這些理論，但這些理論已經被接受為我們的人文傳統的一部分，所以也是應該知道的東西。正是在這樣一種相互期待、相互理解的穩固基礎上，我才得以開展我的工作；也正是在這些人文傳統的共同話語中，我才能夠向我的聽眾們言說。當我引用福柯(Michel Foucault)關於文學作者“在意義增殖中的節儉原則”(the principle of thrift in the proliferation of meaning)以表明文學作者的形象不是作為文本的起源、而是具有文本闡釋的功能(福柯的“作者功能”author function)時，你可以不同意這種分析，但無論是觀點還是表達這一觀點的語言，對你來說都不是陌生的。但是，當我換用中文來表達時，就感覺相當陌生、晦澀，格格不入：這說明我的分析不是中國的，所以，在某些學者看來，也就無助於理解中國文學。

舉出這個例子，想要說明的問題很簡單：我們說的不是同一種語言，不是說我講英語你講中文，而是從更深的意義上說，我說的是一種不同的知識話語，這些話語在我的學術共同體中是共有的，但你的學術共同體卻還沒有共享這些話語。這正是諸多西方漢學著作翻譯成中文時註定遭遇失敗的原因所在，尤其是更有意思的一些著作。我們能夠把字詞從一種語言翻譯為另一種語言，但我們不能輕鬆地轉譯學術共同體及其知識傳統的知識慣例。所以，這些西方譯著讀起來像是糟糕的中文，不是因為糟糕的翻譯或硬譯，而是

因為源語言中那些明晰暢達的內容難免在目標語言中變得相當陌生。而且，不僅僅語言文字很糟糕，所表達的觀點也很糟糕，因為這些觀點不是中國分析傳統的一部分，所以在很多人看來，這些觀點對於理解中國文學也是錯誤的、沒有用的。有一次，我對我的中國朋友說，為了寫作有關於中國古典作品的文章，我需要一個新的詞彙表，但目前在中文中還沒有這樣的一個詞彙表。我的朋友生氣了，他說，完全可以用現有的中文詞彙來討論中國古典作品嘛。好吧，是的，但我的重點不在這裏。要知道，新詞一直源源不斷地創造出來，所有語言都是如此，例如，我不認為1980年前的中文中有“文本”一詞。

所以，讓我說得更清楚一些吧：當我寫作與中國有關的文章時，我不是為中國讀者而寫的，我也不是局限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寫作的，結果，難以避免的是，我的中文論著看起來很異類。我是為西方讀者寫作的。說白了，說英語、說中文時，我的言說非常不同，以至於我甚至不能說同樣的事情，要不然聽起來會非常怪異。原因不外乎過去幾十年間，中西漢學研究不是走得更近，而是漸行漸遠。

那麼，誰是我的讀者呢？首先，是我的西方漢學同行，不管他們是不是同意我的觀點。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我是在對其他人文領域的同事言說。我在東亞研究系做系主任，該系的研究重心是中國、日本、朝鮮的歷史、文學、語言。歐洲、北美也有類似院系。東亞研究系不是存在於真空中，它是大學的一部分，我們必須要向其他領域的同事、要向我們的行政部門解釋我們工作的意義。為了在北美大學中佔有一席之地，漢學，亦即前現代中國的語文學、歷史學研究，必須能夠與周邊的人文學科連接在一起，我們必須要解釋為什麼古典中國值得研究。事實上，我們必須能夠說相同的知識語言、方法論語言，我們必須通過比較來發現中國與其他古代文明之間的異同。否則，我們就無話可說，我們就要面臨自我邊緣化的重大危機。在西方，很難論證說漢學這一不能在整體上融入人文學科的領域何以能夠繼續存在。很簡單，在學術全球化的世界中，在全球化的學術機構中，漢學不應因其本身而存在，漢學研究不能像一個獨立王國，只以自己的術語、自己的方法論展開研究。成為21世紀的漢學家，意味着能夠使中國研究與其他人文學科形成對話。做不到這一點，我們的領域就難以生存，事實上，這一領域並沒有存活於世的理由。

當我以中文展示我的工作時，爲什麼我不能說同樣的知識語言呢？這裏，恐怕我不得不指出一個簡單的事實：不幸的是，在中國，海外漢學的接受相當有限，即便翻譯成中文也是如此（《劍橋中國文學史》是一大例外）。不是漢學的各個子領域都這樣，但毫無疑問，我從事的領域就是如此。非中國的方法沒有得到認真討論，重要的西方刊物和書籍既不易得，也沒有被廣泛閱讀。當然，我理解，在中國，爲了在學術生涯中嶄露頭角，一方面，年輕學者不必關注海外漢學以獲得職位和晉升；另一方面，具有海外經歷、在權威西方刊物上發表論文，又能獲得相應的回報。不幸的是，這二者缺一不可。每天都有中國年輕學者提出申請，想來北美大學做訪問學者，卻又了解我們這邊的工作，這樣的申請通常都會立即遭到拒絕。如果中國年輕學者想要在《通報》上發表論文，這是自1890年以來西方首屈一指的漢學刊物，卻又對西方學術知之甚少，那麼，他的論文也不會被接受。（我可以告訴你們，我正是這份刊物的三名主編之一。）

我認爲，從長遠來看，這對於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一種傷害。如果想要推動、加強我們的領域，我們就該齊心協力，我們就該發展一種真正的國際漢學，在這一領域中，我們大家相聚一堂，我們說共同的語言。在我看來，這一領域不能只是成爲中國研究的中國版，因爲這不能與全球人文學科連接在一起。當然，如果只是因爲中國是一個大國，有數不清的大學院校，就像地球上的其他國家一樣看重自己的光榮歷史，中國版的中國研究也能在中國繼續有所作爲。但是，爲了加入全球人文學科，中國漢學就不能只是服務於中國文化認同這一目的，就不能只是堅持自己的方法論；它必須批判性地融入世界，本質上必須具備比較的視野，還必須將方法置於認同之上。

幾年前，我在香港參加一個會議時談到早期中國文本研究的方法論問題，有學者說：“方法！什麼方法！我們不用談方法，我們做研究就好了！”這是一種誤解：不管有沒有意識到，其實每個人都有方法。說“我們不用方法”，這本身就是一種方法。拒絕對自己的方法進行理論反思，意味着成爲該方法的囚徒。我還聽到過其他一些說法，例如，完全可以用中國自己的術語研究中國，不需要外國的方法、理論，不需要比較視野，一些問題在中國沒有相關性，等等。但是，這裏，我們面臨了一個困境：反對上述這一切，意味着古代中

國文明完全是一個例外，不能與其他古代文明進行相互比較。這種看法不僅是植根於粗糙的意識形態的，還意味着我們這些中國研究的學者不能從其他研究領域的同事身上學到任何東西，而這並不符合漢學的整個歷史。我們總是運用非中國的概念來思考中國，其中的很多概念（例如，民間文學、宗教學，還有近年來的文本概念）在中國和海外學術中都已獲得了穩固地位。不管是直接還是間接，我們都從其他文明的研究中吸收了大量的術語和觀念。不過，最重要的問題還不在這裏。如果中國的確非常例外，其他前現代文明研究所通用的那些方法、理論，對於研究中國的歷史、語言、文學、哲學、宗教、藝術等等毫無用處，那麼，反過來也一樣，研究中國的方法只對中國研究有用，對研究其他文明沒用，所以不管我們在中國研究中發現了什麼，都與人文學科的其他領域沒有任何關係，不會產生任何影響。但，真的可以這樣嗎？

我認爲，上述看法顯然是自己拆自己的臺，受民族主義情緒驅動的中國漢學研究也是如此。它的相關性止步於國界。中國漢學越是變得以自我爲中心，就越會促使海外漢學與中國學術相剝離，因爲在遍佈全球的學術機構和學術共同體中，我們必須能夠富有成效地與其他領域的同事進行交流。我們也需要其他領域激發我們的思考，刺激我們提出我們自己所不能發現的新問題。

只要檢視一下今天歐洲各國文學的研究工作，我們立即就會發現，這些民族國家文學的各個領域都有一個理論和批評方法的共同基礎。法國的文學理論和哲學，對於研究德國文學是有用的，反過來也一樣。沒有人說福柯只能用於法國文學，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只能用於俄羅斯文學，翁貝托·艾柯（Umberto Eco）只能用於意大利文學，伍爾夫綱·伊瑟爾（Wolfgang Iser）只能用於德國文學。任何一個歐洲人，都會覺得這種想法簡直是瘋了。民族國家文學沒有哪一個領域，是由學者或各民族國家的監理所掌控的。各個領域都是人文社會科學學習、探索的共同努力的一部分。每個民族國家的學術傳統都有自己的哲學、批判性思維的寶藏，這些寶藏全都開放，任人取用。但是，身爲漢學家，我無法回避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在中國之外，沒有任何人用中國哲學、中國的批判性思維來解釋非中文的作品。在富饒的中國文學傳統中——這是最古老、最龐大的文學傳統之一——卻沒有

產生出任何一種闡釋理論能在中國之外獲得相關性。

毫無疑問，原因不止一個。從我個人的經驗來看，可以說西方文學研究者過於自滿自足，他們滿足於自己的思考。但今天，西方大學的知識氣候也發生了劇烈變化：如果說數十年來漢學家曾遭受其他領域的同事的忽視，那麼現在，我們越來越多地受到邀請，他們希望我們把我們的視野帶入人文學科。我們的同事渴望了解中國，關於中國的知識有助於他們自己做比較的思考和研究。我強烈感覺到這是我們的機遇。中國傳統可以提供這麼多的東西！我們怎麼可以在談論歐洲小說時不提《紅樓夢》呢？我們怎麼可以在談論世界詩歌時不提唐詩呢？面對那些非常基本的中國思想時，西方理論家、哲學家可以斬獲些什麼呢？為什麼還可以容忍一個受過教育的西方人沒有讀過《論語》呢？

正是在這裏，我看到了今天漢學家們身上最重要的任務。除了做好我們的研究之外，我們還應該學會如何將中國文化解釋給其他文化。當然，只有國際漢學才能做到這一點。這樣的一種漢學，說的是學術共同語，共享的是全球人文學科的觀念。甚至在我們想要彰顯中國的獨特之處時，我們也必須先要理解中國之外的世界，否則，我們如何知道中國是獨特的呢？回到馬克斯·繆勒，他說：“只懂一門宗教，說明不懂任何宗教。”如果我們的目標只是對我們自己說中國如何偉大，那麼，或許，我們得到的只是一個自滿自足的民族國家的中國漢學。但這不能成為我們的目標。我們的希望，我們的責任，是將中國人文學科的寶藏帶給世界。事實上，舍此一途，漢學不能生存，不能活在西方，最終，甚至也不能活在中國。只有真正的國際漢學，才能在全球人文學科中站穩腳跟，就像早已真正國際化的英國、法國、俄羅斯、德國的歷史文學研究一樣。真正的國際漢學，對我們大家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這些要求包括及時跟進彼此的研究工作，能夠不藉助翻譯直接閱讀彼此的研究論著，包括彼此之間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如果哪天終於成功了，研究德國文學的學者就會轉而加入我們的唐詩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歌德；研究死海古卷的學者就會轉入我們的中國出土文獻研究，以便完善他研究古代聖經抄本的方法。這些都不會一蹴而就，但是如果我們想要實現這一切，那麼，現在就是開始的最好時期。在我個人的漢學之路上，我覺得，我才邁出了我的第一步。

（劉倩譯）